阮节庵 这位中山籍革命前辈不简单

原创 中山党史 中山党史 2022-09-19 16:15 发表于广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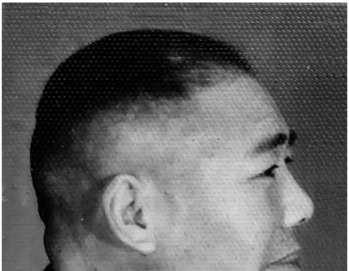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他是阮章的二弟，他是中国广播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他家中召开，他参与护送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六大代表出境参会。

在研究、考证中山籍中共四大代表、北方工人运动先驱阮章的照片的过程中，我们同时发现了阮章几位弟弟投身革命、英勇斗争的事迹。2022年6月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去函中国邮电器材华北公司并获得阮章六弟阮正方于1953年填报的家庭关系档案材料，以此为线索，在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成果中挖掘出一批关联信息，逐渐组合还原出阮家兄弟丰富、立体的群像——三弟阮华珍16岁由党组织派送苏联学习；四弟阮苏学进行地下抗日活动，1945年5月被捕，7月牺牲于狱中；六弟阮正方在1948年发动了天津电信局职工反饥饿、求生存“饿工”斗争，担任职工代表主席团主席，被捕后直至天津解放后才被解救出来。阮章二弟阮节庵又名阮品，1926年入党，1927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就在他家中召开，会上成立了统一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1928年，护送中共六大代表过境苏联的秘密接待站也是设在阮节庵的家。当时通过哈尔滨接待站安排出境的有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罗章龙和李立三等40多位代表，均全部安全抵达莫斯科。

阮华珍、阮苏学、阮正方的事迹已在之前的“中山党史”微信推文中介绍过，本文的主角是阮节庵，一位在多个党史事件中发挥着特殊作用的中山籍革命前辈。

阮节庵（拍摄时间为1957年，照片由阮宝胜提供）



阮节庵（照片由阮宝胜提供）

走上革命道路，与哥哥阮章有关联

阮节庵在1963年11月曾接受黑龙江省党史部门采访并整理出一篇回忆录《东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及其他》[注1]，文章讲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领路人是他的同学刘玉书，一位由阮章介绍入党的唐山人。1925年4月，刘玉书与阮节庵在哈尔滨重逢，从此往来密切。同年8月刘玉书介绍阮节庵加入共青团，10月获批准。入团谈话人就是哈尔滨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吴丽实（吴丽石）。

阮节庵毕业于奉天无线电学校，之后在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工作，住在道里十二道街，无论是工作单位还是住处的位置都适合于开展通讯联络工作。于是，阮节庵使用了一个“魏仲仁”的化名。组织交代他，“以后有人给你来信你就收下，但不要告诉其他同志。”当年11月，吴丽实整顿哈尔滨的党团组织，建立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委员会并任书记[注2]。冬天，吴丽实发展阮节庵入党，在1926年元旦期间获批准。从此，阮节庵兼做党、团的通讯、接头工作，而且是单独活动，为方便隐蔽不参加支部或党小组的活动。

1927年负责哈尔滨地方团组织工作的李纪渊曾在阮节庵家里住了一段时间，而此时阮节庵已是哈尔滨地方团组织的委员[注3]。李纪渊是瞿秋白的学生，1927年11月任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他斗争经验丰富，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教育，创办工人夜校，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迅速成长起来。1928年9月，李纪渊要调走，把地方团工作交给阮节庵暂时代管。9月至10月，阮节庵任共青团哈尔滨县委书记（这时期哈尔滨的共青团组织名称经历了市委、临时县委、县委等变化）。“当时哈尔滨有团员50多人，分4个支部。”阮节庵在回忆录中写道。

阮节庵还把妻子沈允慈发展为共青团员（后转为党员）。沈允慈在电话局工作，夫妻俩志同道合，一起出色完成了多个重要任务。

阮节庵沈允慈与女儿合影，拍摄时间为1930—1931年间。（照片由阮宝胜提供）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代会在阮节庵家中召开

在东北地区的党史中，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的建立是一个重大事件，其成立的会址，就是阮节庵夫妇的家。

据阮节庵回忆，1927年10月，他家从前院搬到后院，搬家不久，李纪渊就告诉他，党组织要在他家召开一次会议，人很多，要做好准备。于是他们夫妻俩马上收拾房间，买了一些吃的东西，两天后，开会的人来了。

会议的具体情况在《中共沈阳地方史（1919—1949）》[注4]中有详细记述。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彻底撕下革命伪装，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组建北方局，以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为秘书长,负责管理顺直、山东、满洲、山西及内蒙等地党的组织与工作。中共北方局成立后,根据东北情况的变化,为加强东北地区的工作和统一奉、吉、黑党组织的领导，决定派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陈为人到东北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并重新组建中共满洲省委。

1927年10月14日，陈为人从天津抵达奉天,经过辗转曲折与吴丽实（吴丽石）、张任光等人取得联系，共同开始了筹建中共满洲省委的工作。吴丽实就是阮节庵入团时的谈话人。他们分别到各地串联，广泛开展工作。经过10天的紧张准备,1927年10月24日，陈为人主持召集哈尔滨、长春、吉林、奉天、大连等地东北党的活动分子共14人在哈尔滨道里十二道街中共地下党员阮节庵家里召开会议，这就是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参加者中，阮节庵认识陈为人、吴丽实和李纪渊。但阮节庵没有讲述怎样认识陈为人。陈为人是哈尔滨党、团组织的创建者之一，阮节庵曾负责党、团的通讯、接头工作，两人因工作交集而认识也极有可能。陈为人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后来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保卫了中央文库的安全。

陈为人（图片来源：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龙志网）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听取了陈为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的报告，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选举陈为人、吴丽实等7人为临时委员会委员，陈为人为书记兼宣传部长, 吴丽实为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

大会通过的《政纲》和工人运动及农民运动的两个“决议案”反映了当时东北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这是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在东北地区的具体应用。中共满洲省临委的建立,使全东北地区党的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为各地党组织指明了新形势下的工作方向,振奋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革命精神，使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内模拟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场景的雕塑。这就是阮节庵夫妇的家。（图片来源：哈尔滨党史纪念馆）

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非常成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阮节庵负责掩护，沈允慈为会议烧水做饭。会后，吴丽实指示阮节庵立即搬家到哈尔滨道外四道街一个俄国房子去住。

护送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六大代表出境参会

1928年4月的一个晚上，李纪渊带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到阮节庵家，他就是瞿秋白，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李纪渊在上海大学读书时，瞿秋白是他的老师。在阮节庵家中，瞿秋白一再叮嘱李纪渊和阮节庵要千方百计尽全力做好接待中共六大代表的工作，确保安全出境赴苏开会。瞿秋白第二天就踏上了前往苏联的旅途。其实，他知道妻子杨之华与女儿即将来哈尔滨，但肩负重任的瞿秋白放下儿女情长，尽快前往莫斯科，提前做好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注5]。

早在1928年春，为了保证中共六大代表的安全，使代表准时赶到目的地，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安排了地下交通站秘密接应代表过境。哈尔滨地方党组织做好安排，李纪渊负责接待站工作，秘密接待站就设在哈尔滨的道外四道街（又叫面包街，后名红专街）的一座平房里，这就是阮节庵、沈允慈夫妇的家。阮节庵和李纪渊一起负责接待工作，沈允慈和原在上海党中央做翻译、朝鲜族的小白，也参加接待工作。此外，中共中央还派龚饮冰、何松亭和在中共中央妇委工作的杨之华到哈尔滨协助完成接待工作。龚饮冰当时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会计。杨之华带着女儿独伊到哈尔滨后，被安排住在阮节庵家里，随时接待来哈尔滨的中共六大代表。[注6]

接待中共六大代表的哈尔滨秘密接待站（图片来源：哈尔滨新闻网）

中共六大代表秘密接待站遗址，今哈尔滨红专街20号哈尔滨画院。（图片来源：《生活报》）

从1928年4月开始，关内的中共六大代表陆续来到哈尔滨，他们按照接头地址和暗号与小白或李纪渊会面，接头地点设在道里中央大街的一处故衣店里。小白在那里以店员身份作掩护，随时会见来哈尔滨接关系的代表，暗号是：以一盒火柴，抽出几根一齐折断。关系接上后，再由李纪渊通知杨之华，由杨之华或阮节庵夫妇安排食宿。

单个来的男同志，通常由杨之华带着女儿一块活动，对外就说是一家人，当时杨之华的女儿独伊只有6岁，但很懂事，杨之华教她，如有人问就说一起的男代表为爸爸。

从哈尔滨出境到莫斯科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乘火车往西去满洲里，二是乘火车往东去绥芬河。西走满洲里线路的，临行时，由接待站交给每位代表一个号码牌。到了满洲里后，在车站附近就会看见两辆马车等候着，车前挂了车灯，代表手里的号码牌和车灯上的号码对上时，把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就可以上车，然后，马车偷偷越过边境，边境那边设立了接待站，负责安排换乘火车去莫斯科。

走绥芬河路线的，由哈尔滨乘火车，到达绥芬河后，与一个苏联铁路工人接头，被安排在他家休息吃饭，到了晚上，由这个苏联人带路，翻山涉水走过很长的路才能过境。晚上起程，到第二天早上才能进入苏联境内，然后先乘火车去海参崴，再由海参崴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哈尔滨接待站尽量安排代表们走满洲里线而不走绥芬河，因为从满洲里线到莫斯科距离更近。但有时来的代表比较多，就得分散行走。

绥芬河秘密交通线纪念馆（图片来源：黑龙江日报）

由于考虑到南方代表的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唐宏经就是其中一位，他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我到车站买了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带着他们乘上火车。一路上他们尽量不说话，一切由我出头。”

由哈尔滨秘密接待站护送出境参会的还有两位中山籍的中共六大代表——杨殷和黄平，历史让三位中山籍的革命者相聚于哈尔滨。黄平回忆：1928年5月间，中央通知我去莫斯科参加六大，我奉中央之命带着三个香港海员同志一起去。我们是乘日本船到大连，同船去的有杨殷，但是我们装着不认识，我们坐的是统船。船到大连时日本警察盘问杨殷，杨殷说他是做药材生意的，并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些药材样品给他们看，警察就走开了。我们从大连乘火车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接上了关系，并得知在满洲里怎样过境的办法。我们住了两三天，就和杨殷一起乘火车到满洲里，在车站附近找到一辆某某号码的俄国马车，我们说出接头暗号，坐上马车，他就带我们跑了一个很大的半圆圈进入苏联境内。转乘火车到赤塔，在赤塔又住了几天，苏联的有关部门来查我们是否带有私货，没有发现什么就走了。住了约一个星期，我们乘火车到了莫斯科。

杨之华在1964年对这段经历回忆了许多细节。“为了避免路上出问题，当时决定代表们分期分批地走。我记得第一批是秋白同志，第二批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我是第三批走的。当时东北的白色恐怖也很厉害，特别是大连，在日本人占领下盘查得很严。据说，前两批代表

在大连都遭到盘查和扣押，周恩来同志在受到盘查时，敌人曾公开质问他是不是周恩来。”对于阮节庵夫妇，她回忆道：“到了哈尔滨，我带着孩子住在道里江边公园附近的一个同志家里。这家只有夫妇二人，这时候，因为哈尔滨地下党组织做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有困难，组织就临时决定我留在哈尔滨帮助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带着孩子便于掩护。”“我和每个来的代表住的地点并不总是一个地方，有时在道里区，有时在道外区，但大部分是住在同志家里，有时也住在旅馆，在我到哈尔滨最初落脚的那个同志家里，也曾和代表住过。记得那是个平房（或许是一楼），代表睡在里边床上，我和女儿睡在地板上，我住在这里，平时是不上街的，因为口音不对，怕出去惹麻烦，所以当时吃饭都是由同志给买回来吃。”“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我只是临时做了一个多月，整个工作，哈尔滨地下党的同志做了许多。1928 年5月，我最后一个离开哈尔滨，6月份到达莫斯科时，会议已经快要召开了。“[注7]

就是这样，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们分批出发，到哈尔滨后又重新编组，随时被安排去中苏边境。通过哈尔滨接待站安排出境的有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罗章龙、李立三、夏曦等人。据记载，经哈尔滨接待的六大代表共40多位，他们都安全到达了莫斯科，从而保证了中共六大的顺利召开。

参加中共六大后回国的代表，也有经过哈尔滨接待的。如罗章龙1928年9月回国时经过哈尔滨，也有人接待，但不是哈尔滨地方党组织，而是共产国际交通局设立在哈尔滨的接待站。

接待护送任务完成后，一天，李纪渊到了阮节庵的家，指示他烧了很多文件，“把炉筒都烧红了”，随之，阮节庵搬家到马家沟。

中国广播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

据阮节庵自述，1927年他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发展了张志祥等两名党员，三人编为一个支部，阮节庵为支部书记。据陈尔泰著《中国广播史考》考证，阮节庵是中国广播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三人党支部是中国广播界最早的党支部。[注8]

陈尔泰在《广播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文中写到，1923年刘瀚与共产党人陈为人、李震瀛合作创办的哈尔滨通讯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利用无线电的新闻机构，但是，陈为人和李震瀛这两位受李大钊派遣的共产党人是到哈尔滨发展党组织的，虽然同广播有些间接的关系，但两位并不属于广播人。那么，在中国广播的历史上，广播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是谁？

1923年刘瀚与共产党人陈为人、李震瀛合作创办的哈尔滨通讯社。（图片来源：哈尔滨党史纪念馆）

据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的龙志网介绍，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原址位于哈尔滨市王兆屯铁路平房内（今动力区文治街165号），1926年10月1日，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正式广播，每天广播两小时，广播内容为钱粮行情、新闻、音乐、文艺等。节目内容、技术质量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东北地区一般收音机可以听到它的清晰的声音，北京四管以上收音机也可以收到它的广播。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是刘瀚在不断熟悉精通有线电报和无线电报通讯技术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的改造而创建的。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座无线广播电台——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历史资料图片）

1981年刘瀚的长子刘宗唐接受陈尔泰采访，他说，1926年7月，哈尔滨在南岗转角楼莫斯科商场与普育小学之间的房间进行广播展览时，广播喇叭所发出的声音来自王兆屯铁路路堑南侧一所俄式平房，即今天的哈尔滨动力区文治街165号。当时那里设有广播发射机和临时播音室，负责广播发射机的人叫阮品，是共产党员。台里还有一位广播技术人员，叫张致祥，也是共产党员。阮品给人的印象是有魄力，敢做敢为。1982年，刘宗唐夫妇受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厅邀请到哈尔滨帮助寻查当年广播遗址时，也再次讲到在动力区文治街165号当年阮品负责广播发射机的情形。陈尔泰考证这位阮品就是阮节庵，而中山党史研究室获取的阮正方1953年填报的家庭关系档案材料就有提及“二哥阮节庵又名阮品”。张致祥就是阮节庵发展的党员张志祥。

《广播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文中还有一个关于阮节庵的爱国故事。1998年作者去北京探望刘瀚的弟弟刘准，刘准说到1928年阮品主张哈尔滨广播电台停播日语节目，以支持哈尔滨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在我国修筑五条铁路的行动。后来哈尔滨广播电台把日语节目取消，改为英语节目。阮节庵毕业于奉天无线电学校，与刘准是校友，阮节庵毕业不久就进了刘准哥哥创办的哈尔滨广播电台工作；刘准字仲仁，而阮节庵曾经使用过“魏仲仁”的化名。由此看来都有着关联。

据阮节庵自述，1929年8月，哈尔滨广播电台突然调他到营口，并且限期三天离哈，原因是阮节庵曾发动电台人员为增加工薪举行了一次斗争，结果每人增加了哈洋五元（当时电台人员一般月工资为哈洋 40元，折合大洋28元）。这次突然调走，没有来得及与组织联系，他们到营口后就与组织失掉了联系。阮家后人告诉中山党史研究室，阮节庵这次搬家正值大女儿出生后刚满月，他拖家带产妇、婴儿三天内搬到另一城市。由于当时与组织的接头是定时定点单向的，因此，一旦失去了联系，之后阮节庵虽多次寻找组织，均无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阮节庵曾经在天津市民政局工作，1964年因病去世。尽管他为革命做出了这么多贡献，却很少跟后辈提及，阮家后人只知道他曾参与过党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接送过领导人过境，但知之不多。直至2022年上海、中山、天津、唐山等地专家、学者们考证阮章照片有了重大突破时，阮家后人才连带在一些党史书籍中发现关于阮节庵的记载，中山党史研究室跟进挖掘，从而深入了解到阮节庵这段闪耀的尘封历史。阮节庵、阮章等革命先辈们默默奉献、不求名利的高风亮节，确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1.参见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五辑，1986年印行，第49-52页

2.李景田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 1921—2011）》人物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

3.参见刘秀华、张旭东主编：《中共满洲省委史话》附录——中共满洲省委人物名录，沈阳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

4.参见中共沈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沈阳地方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93—100页

5.参见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哈尔滨先锋网：《面包街上的秘密接待站(3)》，2016年12月10日

6.本节部分内容参见《火柴盒承受的使命》，李蓉、叶青如编著：《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9页

7.参见杨之华：《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回忆》，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黑龙江党史资料》第五辑，1986年印行，第70—71页

8.参见《广播人中最早的中共党员》，陈尔泰：《中国广播史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3页

文字：黄春华、邱霖巧

一审：卢丽燕、林婷婷
二审：李丽静
三审：黄春华

中山党史
存史鉴今传薪火